

走出文革連載2

走出文革

一籃銀元

(接上一期A18版面)

這個故事被我母親說了半個多世紀，聽者無不動容。

除了觀世音菩薩顯靈的故事，那一籃子銀元的故事也是我母親經常會提起的。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的邵逸青和王瑾士住在建國西路的一所高檔別墅裏。除了打蠟的地板，花園，記憶最深的是在別墅裏吃過的午餐肉罐頭，不是後來常見的那種小罐頭，而是美軍的戰後剩餘物資，切成薄片後和切片面包一樣大小，夾在一起吃，幾十年都忘不了那滋味。

王瑾士被捕後，軍人搜查並沒收了她的別墅。慌亂中，邵逸青祇

來得及在手腕上多戴了幾塊表，便被逐出家門。

王瑾士被判刑，多少有點為中華書局董事會承擔了責任，當了替罪羊。在他死後，留在香港的中華書局同仁多方設法，幫助邵逸青度過了艱難歲月。在近幾年出版的中華書局史料中，王瑾士當年為書局的發展所做過的努力倒也得到了肯定。

王瑾士被捕後，我父親仍和邵逸青保持着來往。八十年代末，我父親和邵逸青先後去世，而我在1982年去美國後也不再聽到邵逸青一家的任何音信。

九十年代初，我回國經商，為美國維蒙特(Valmont)工業公司在上海籌建工廠，生產路燈杆、電力

杆和通訊杆等產品。上海電力局是我們最重要的客戶之一。雖然維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產這一類產品的公司，但在籌建初期我們却無法進入上海電力局的市場。

書生經商，學不來那些無往而不勝的攻關手段。正當我在辦公室冥思苦想尋求良策時，一個很少聯系的遠房親戚突然從無錫跑來找我。不經意中，他講了一件對我而言不啻是石破天驚的事：堂堂上海市電力局局長顧寅章竟然就是邵逸青的外孫女婿。

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邵逸青的女兒，顧寅章的丈母娘，小名叫朵朵，也是我年輕時非常熟悉的名字。我一個電話

打到局長辦公室，讓顧局長的秘書轉告他我是朵朵的親戚，求見局長大人。

因為這個小名很少有人知道，在我父親去世後我一直在尋找葉家人下落的朵朵立即猜到是我打的電話。一年後，她便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但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我因她而得以和顧寅章一家相認相識。在顧寅章的支持和幫助下，新生的維蒙特(中國)公司順利地度過了三年襁褓期。

如果不是命運的安排，我不知道還能如何解釋這一連串的巧合！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阿春的小方巾

我的童年也是在貧苦中度過的。讓我奇怪的是，童年的記憶中最清晰的幾件事却是關於性的朦朧覺醒。

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的父母因為無力賃屋居住，祇能各自住在擁擠的工廠宿舍裏，將我和幾個姐妹交給浮舟村裏一個叫阿春的胖嫂照料。

這阿春，說得闊氣一點，就是我的保姆，酷像魯迅先生筆下的長媽媽。她們不僅一樣胖，而且有着完全相同的睡姿：“一到夏天，睡覺時她又伸開兩腳兩手，在床中間擺成一個‘大’字……”

一到夏天，阿春不僅在床上擺成“大”字，還全身赤裸，祇在關鍵部位蓋了一塊小方巾。當年幼的魯迅，或按長媽媽的稱呼“哥兒”，“感覺擠得沒有餘地翻身，推她呢，不動；叫她呢，也不聞”時，我却在好奇那方巾下的秘密。夏日的一天下午，我終於受不住誘惑，趁她熟睡時掀開了那塊小方巾。

不料，阿春不僅比長媽媽年輕，而且容易驚醒得多。我既未推

又未叫，祇是輕輕地掀動了那塊蓋在身上的小方巾，她便圓睜了雙眼。

我被罰坐在一張小板凳上面壁思過。

我至今記得我面壁時十分擔心阿春會向母親狀告我的不軌行為，因而害怕得很。但她沒有，而且很快原諒了我。或許是我楚楚可憐的樣子讓她感動，她心疼地將我抱起，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我一起洗澡。

所謂澡盆，就是竈上的一個大鐵鍋，將鍋中的水燒熱後在鍋底擱塊木板，人就坐在木板上洗澡。

鄉下的竈間照例是光線不足，但那一幅裸浴的畫面却在我的記憶中十分鮮明。

阿春的小方巾和大鐵鍋喚醒了我對性的朦朧感覺，那時我年僅四歲。

六歲那年，我進小學讀書。校捨是個被廢棄的土廟，供有泥塑的菩薩。幾個班級都在大殿裏上課，可以互相觀望。不記得用了什麼課本，但記得上課時我總是喜歡偷聽其他班級的講課。現在想來，阿

春將我早早送去土廟讀書并非是為了讓我不輸在起跑線上，而是為了騰出時間幹農活。

學校放學時會清場，有一次我藏在菩薩背後，躲過了清場，但等我和菩薩玩夠了想出去時，發現大門已被鎖上。大人見我没有回家，自然很着急，四處尋找，而我也在裏面叫天天不應，泥塑的菩薩并不念及我們剛建立起來的友情而顯靈。

這土廟沒有窗戶，照例在高處開了一個圓洞，就像孫悟空變的土地廟，除了尾巴變成旗杆，也沒忘記在牆上開了兩個圓洞。我將桌椅板凳架成“梯子”，居然爬到了圓洞裏，雖然離牆外的地面挺高，但我已無退路，閉着眼睛跳了下去。

十多年後，清華兩派學生武鬥，我從學校的主樓逃跑時，也是不顧一切地從窗戶跳下去的，兒時的經歷算是一次預演。

另一件記憶深刻的事是我曾經偷了臨桌同學的一支鉛筆！因為父母在上海，而阿春不捨得或不懂得讀書是需要筆的，沒有給我買。同學告發後，老師讓大

家將書包放在桌上搜查。我急中生智，將鉛筆塞在桌子的板縫裏，逃過一劫。事後怕被發現，又悄悄地轉移贖物，將鉛筆塞進場地上的高高的稻草堆裏，消滅了罪證。

夜深時讀張少帥的口述歷史，一邊讀，一邊發微信。看到少帥將他年輕時偷雞摸狗的事講的津津有味，眉飛色舞，也就心血來潮，將這六十多年前的一樁糗事向遠在美國的“信伙伴”說了出來。東方既

白後，我將微信稍作潤色，公之于眾。希望能博得同情，一支鉛筆讓我記了一輩子呀。

很奇怪，兒時的許多場景都歷歷在目，除了頑皮和順手牽羊之類的事，還有如“阿春的小方巾”一類兒童不宜的。張少帥雖然口無遮攔，但我注意到，他在關鍵時候也常有口頭語：“我不說，我不能說啊。”

別的學不了，這一句要學到。也有值得驕傲的事留在記憶中。父母在香港時給我買了一些帶繪畫的兒童讀物，那些非常童趣

的插圖像是豐子愷畫的或是模仿他的風格。書中的故事大多忘了，但一直記得我是從這些兒童讀物中知道了有個大人物叫孫中山。當我將這些書帶到學校和同學分享時，我有了記憶中最早的被老師表揚的記錄。

在這個農村小學我祇讀了幾個月，在我被父母接到上海後又進了另一所小學，算是有了正規的教室，正規的課本，但依舊沒有令人驕傲的名聲和校史。那是解放後政府為工人子弟辦的學校，全名是上海市紡織工人第三子弟小學。校齡和我的學齡相同，現在已不存在了，連度娘都找不到它的任何記錄，更不會有什麼校慶之類的紀念活動了。

學校離家挺遠，從來沒有人接送，自己走去的。有一次掉進臭水溝後，腳爛了，十個腳趾粘在一起，用手分開後血肉模糊。家裏沒有紗布，沒有藥，外婆用浸了豆油的草紙替我包扎。每天一癩一癩走到學校，非常疼。但有一次睡過頭，驚醒後我跑步奔到學校，一路上居然忘了疼痛。(未完待續)

南京·东京連載2

南京·東京(三)



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

2.“手島右卿‘崩壞’了我”

隨着時間的推移，劉洪友與書畫藝術家的接觸越來越多，在書法界漸漸被人們認可和接受。

有一次，著名書法家武中奇到賓館來創作，劉洪友拿自己的楷書、行書作品請武老指點。也許是武中奇看出了劉洪友的書法功底，表揚他寫得不錯，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問題。從言語中能看得出他對面前這位年輕人是另眼相看的，否則他不會主動說“我給你寫兩個字”。劉洪友并不知道武老要寫什麼字，看到他落筆寫的是“新苗”，心裏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這是書法前輩對自己的充分肯定和莫大的鼓勵與鞭策。劉洪友在眾多前輩的關心和幫助下，得到了不少參

加各種文化交流活動的機會，尤其是中日書法交流，讓他受益匪淺。

中日書法的交流源遠流長，說起日本的書法，可追溯到彌生時代。日本人現在使用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也是來源於中國書法的草書和楷書。在盛唐時代，日本的遣唐使把大量的中國書法文化帶回日本；後來鑿真東渡，進一步通過抄寫佛教經文，推動了日本書道的發展。飛鳥時代的聖德太子、奈良時代的聖武天皇都酷愛抄寫經書，還在國家事業處設置了寫經所。皇室的參與，起到了引領和推動中國書法文化在日本流傳、發展以及普及的作用。日本國在學習和傳播中國書法的同時，逐漸形成了日本書法自己的風格——和樣體。

日本人熱愛書法，學習書道已經成為許多國民修身養性、陶冶性情的必修課。到上世紀70年代，隨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與中國同根同源的日本書法隨着日本電器產品一道進入了中國。1978年，日本名古屋市和南京結成友好城市。兩地的書法交流也頻繁起來。日方來賓有青山杉雨、梅舒適、今井凌雪、種谷扇舟、岩田文堂、豆子甲水等書法名流；南京方面有資格參加這種交流的有林散之、陳大羽、蕭娴、武中奇、尉天池、章炳文等資深書法家。劉洪友雖年輕，可他聰敏好學，功底扎實，有時老師們也

會帶上他去參加交流會。

劉洪友回憶說：“那時候來南京交流的日本書法家，基本上都下榻在像雙門樓、南京飯店、東郊賓館這類一流涉外賓館，日本的書道家經常帶一些諸如服裝、圓珠筆、日式傳統工藝品作為禮物送給我們，當然我們也會回贈一些毛筆、硯臺等有中國特色的東西給他們。”

同期參加過書法交流的書法家王志華介紹：“當時日本處於經濟發展的成長期，中國的物價在他們眼裏很便宜，他們來後都會請我們吃一些大魚大肉、海參燕窩等山珍海味，在當時，對於我們來說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那時，改革開放剛開始，平時餐桌上很少吃到葷菜，能吃上如此美味，簡直像是過年，個個吃得肚臍眼兒裏往外冒油。來而不往非禮也。吃了日本友人的飯，我們也想着回請他們，可當時一桌菜的價格相當於我們國內一般人半年的薪水，哪裏能請得起呢？結果還是善解人意的日本朋友幫我們結賬，幾次下來都這樣，形成了慣例。所以這樣的交流大家都爭先恐後去參加。”

中日書法家們沒有翻譯隨從，可這絲毫不妨礙他們之間的溝通。因為日本書法家書寫的也是漢字，彼此都能明白所要表達的意境。人們都說“藝術不分國界”，看來的確如此。大家歡聚一堂，交流經驗，切磋技藝，取長補短，其樂融融。書法家們當場揮毫落紙，一揮而就寫成自己的作品。在這樣的交流氛圍中，劉洪友如魚得水，如饑似渴地汲取着前輩書法家的技

能技巧和知識，逐漸也對日本書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不久，一場日本書法家在北京的書展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迹。

這次書法展出的是手島右卿的作品，他出生在日本國的高知縣(日本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一開始師從曾經留學上海的川谷尚亭。當年，在日本書法界流傳着“東有鈴木翠軒，西有川谷尚亭”的說法。手島右卿得到了川谷尚亭的真傳。川谷離世後，求知若渴的他又于1935年拜當時頗負盛名的比田井天來為師。比田井天來是“象書”少字數書法的創始人，素有“現代書法之父”之稱，是當時引領書法新潮的革新派。他把東方文化的精髓和現代的感悟相結合，推陳出新，自成一統，成就了獨樹一幟的“象書”少字數書法。手島右卿青出于藍勝於藍，集兩位老師之長，將“象書”少字數書法推向了極致。這樣的書法展對於酷愛書法的劉洪友來說，無疑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如同吃日本人請的山珍海味大餐，那是無論如何也要參加的。他選擇在一個周六的晚上出發，買了一張北上的硬座火車票，歷時八個多小時，車行千裏。第二天早上，火車的廣播裏播放着歌曲《我們的明天比蜜甜》《浪花裏飛出歡樂的歌》，陸續喚醒了一車旅客。歡快的旋律，正好是馬上就要吃到“大餐”的劉洪友的心情寫照。

劉洪友來到天安門廣場，莊嚴肅立，向陽光下的天安門城樓、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致敬。廣場東側便是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他將在這裏得到一次文化和心靈的洗

禮。劉洪友來到大廳，祇見大廳裏人頭攢動，來自全國各地的書法愛好者聚集在大廳裏，他們或聚精會神默默地注視欣賞，或和結伴而來的好友小聲評點。

擠在人群裏的劉洪友被手島右卿的書法震撼了，他的作品一改中國的詩詞歌賦書寫，而是用一兩個字，最多四個字組成。每個字小則僅尺，大則尋丈，看起來簡潔、單純、明快，一目了然。再看作品的着墨，有輕有重，濃淡相宜，打破成規，完全是一種全新的藝術風格。劉洪友被深深地觸動了，他在心中自問，書法還可以這麼寫？

思考的同時，他的目光被一幅名叫《海》的作品深深吸引了過去。《海》不像是一件單純的書法，更像是抽象派藝術大師波洛克的——一幅激情油畫。看得出，手島先生的這幅《海》，是傾其全部的生命意識于筆墨之中，如狂如醉，肆意忘我，神灑筆鋒，一氣呵成。這件一揮而就的書法作品，讓人聯想到海上的狂風驟雨，這種內心世界的豐富傳遞，起到了震撼心靈的藝術效果。這幅《海》的魅力在哪兒呢？喜歡鑽研的劉洪友揣摩着：《海》並沒有破壞傳統的筆墨及文字結構與審美的基礎框架，與傳統書法共通，它從漢字字義中引申出來，和當今快節奏的生存環境相呼應，包含着大自然萬象的感悟，給當代一種新的審美意象和視覺衝擊，這些特點又有別于傳統的書法藝術，它是現代風格和古典元素完美結合的產物。(未完待續)